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佛學與藏學（一）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三四冊

佛學與藏學（一）

石泰安等著 耿昇譯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山川巍峨，人杰地靈，文化積澱深厚，西藏文化吸引了全世界，故而藏學也在全世界。讀者通過這部譯文集，便可以窺見塞訥河畔、盧浮宮旁的藏學研究的點點滴滴。法國的藏學研究，基本上還是公正的，屬於其考據派傳統範疇。大多數法國藏學家還是堅持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論述西藏傳統文化，滿懷對於西藏人民，乃至對整個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他們處理資料的手段、觀察問題的角度、以他方的觀點來看待西藏傳統文化的態度，都值得我們借鑒，會對我們產生不少啓發。他山之後，不僅可以攻玉，而且也可以做鏡子使用，明鑒歷史，啓迪未來。鑑于種種原因，譯者不揣淺陋，翻譯了這批法文的藏學論文。這一則是為饗國內學術界，二則也是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佛學與藏學》一書，又名《法國的西藏學》，書中共收入十編，五十七章學術著作，以法國的藏學家著作為主，但也有個別其他國家的藏學家在法國工作和學習時發表的文章，或者是在法國參加學術會議與作學術報告時提交的論文，也有在法國攻讀博士論文或進修期間的著作。事實上，它們也形成了法國藏學界的組成部分。

由於篇幅較大，故祇得將《佛學與藏學》一書分成五冊，分別為《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的第134—138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佛學與藏學（一）

耿昇譯
石泰安等著

法國藏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代序)

耿昇

法國的藏學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前後出現過數代著名藏學家。他們的成果甚為豐碩，在歐洲的藏學研究中處于領先的地位，在整個國外的藏學研究中也名列前茅。

法國早期的藏學研究代表人物是雅克·巴科 (Jacques-Bacot, 1877—1967)。巴科是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教授、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1946—1951年間任法國亞細亞學會會長。他于 1906—1910 年前後曾兩次赴西藏東南部進行考察，穿越瀾滄江上游，到達打箭爐（康定）西北的雅礱地區。他又轉向東南，企圖抵達雅魯藏布江流域，雖未成功，却首次發現了伊洛瓦底江的源頭。他早年曾受伯希和委托，編寫伯氏劫往巴黎的敦煌藏文寫本目錄，可惜其成果未能出版。

巴科于 1940 年與圖散 (Charles Toussaint) 和托瑪斯 (P. W. Thomas, 1867—1950) 合作出版了名著《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一書。該書考證了敦煌藏文寫本 Pt.1286、1287、1036、1047 和 1290 號等吐蕃古代史文書，首次發表了《吐蕃歷史大事紀年》、《吐蕃贊普世系牒》以及《吐蕃小邦王臣傳》等稀世敦煌藏文文書，他們為古代吐蕃史的研究獨闢蹊徑。在此之前，世人對於西藏古代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漢文史籍、以傳說為基礎的晚期藏文著作以及零

散發現的金石木簡等資料。由於敦煌文書是 10 世紀之前的作品，其中不少甚至是與事件發生的同時寫成的，而且也比較系統地涉及到吐蕃的政治、軍事、宗教、法律、社會、生活、經濟、風俗習慣、歷史傳說以及天文曆法諸領域，所以它們成了研究吐蕃史的直接資料。巴科等人的書出版之後，各國學者爭相評論，對古代贊普世系譜爭論不休，形成了法國研究敦煌藏文寫本的第一次論戰高潮，揭開了吐蕃松贊干布之前“神話贊普時代”的神秘面紗。

巴科于 1956 年在《亞細亞學報》第 244 卷中發表了《8 世紀 5 位回鶻使節對高地亞洲的考察》一文。他在伯希和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 Pt.1283 (Pt. 係指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的編號。——譯者) 作了考釋，該文後來又轉載于 1957 年出版的《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高地亞洲寫本》一書中。伯希和在 1927 年于法蘭西學院授課時，就講解過該文書。這卷寫本的內容是出使吐蕃北部各民族的使節所寫的報告，其中涉及到了中國西北的民族、地理、歷史、王統、物產和習俗諸方面，是研究中國西北民族史的寶貴資料。巴科考證出該文書是先用突厥文寫成的真實考察報告，後譯作藏文，所以他認為這些使者都是回鶻人。

此文發表後激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諸家紛注的轟動局面。在此之後 30 多年來，國內外發表了許多考證的論文。例如，英國學者克洛松 (G. Clauson) 1957 年在《亞細亞學報》中發表《Pt.1283 號考》。他認為該文書是先譯成漢文後譯成藏文的。匈牙利學者聰果爾 (B. Gsongor) 1960 年在《匈牙利東方學報》上發表《論敦煌藏文寫本中的漢文術語》，探討了這卷寫本中藏文術語的漢文原形。匈牙利學者李蓋提 (L. Ligeti) 1971 年在《拉露紀念文集》

中發表《北方王統報告》，他認為此文不是作者根據使者們的親眼所見寫成的報告，而是匯集了有關吐蕃北方諸民族的傳說。此外，日本學者森安孝夫 1977 年在《亞非語言文化研究》第 14 冊中發表《藏文文獻中出現的北方民族突厥和霍爾》，1980 年在《匈牙利東方學報》第 34 卷第 1—3 期中發表《Pt.1283 號新釋》。匈牙利學者特茲坎 (Tezcan) 1975 年在安卡拉發表《論 Pt.1283 號寫本》。法國學者韓百詩 (L. Hambis) 1958 年在《亞細亞學報》中發表了《克什的迷考》。匈牙利學者烏瑞 (Geza Uray) 1979 年在《伊斯蘭教之前的西域史》中發表的《有關 750 年左右西域史的藏文資料》等一大批論文。

參加這場大辯論的，還有塞格萊迪 (Czegledy) 和古米列夫 (Gumilev) 以及中國學者王堯和陳踐先生，他們都專門研究過這卷敦煌藏文文書。

所有論文均以巴科的開拓性研究成果為基礎，事實證明巴科的考釋基本正確。這場大辯論形成了法國對敦煌藏文寫本的第二次大論戰。它使人們更清楚地了解到吐蕃與其北方民族的關係，提出了中國北方民族史上的某些重大問題。

巴科的西藏史代表作是 1962 年由亞細亞學會出版的《西藏史概論》一書。該書是法國第一次撰寫西藏通史的嘗試。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是“吐蕃贊普”，從傳說中的天神贊普一直講到吐蕃王朝衰敗時期。第二章是“藏傳佛教和神權政體的發展”，從藏傳佛教的發祥一直講到西藏和平解放。第三章是“附錄”，主要是匯集和譯注了一大批有關西藏古代史的資料。這部西藏史在論述西藏的歷史和文明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但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那種國際與中國國內形勢的影響下，此書形成了法國藏學研究史上罕見的一次內含對中國說三道四的地方。不過巴科自此直到逝世，再未更多地重複這類中傷中國人民的謬論。

巴科于 1921 年通報了法國高等實驗學院所藏藏文書的基本情況。1962 年在《亞細亞學報》中發表了《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圖書館所藏坎斯塔先生特藏中的藏文書籍資料目錄》。他從中國、特別是從西藏地區及其周邊地帶攜回了一大批內容豐富的藏文書籍、資料、繪畫和其他搜集品，後來入藏集美博物館和亞細亞學會圖書館。

大衛·妮爾 (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 年) 可算法國的一位傳奇性的女英雄了。她在其 101 歲的生涯中，曾先後于 1918、1923、1938 和 1944 年 4 次到中國藏區（四川、雲南、甘肅、青海藏區和西藏本地，甚至包括拉薩），從事科學考察和探險。她曾收養了一名藏族喇嘛雍登 (Yungden, 因他出生于哲孟雄，即今之斯里蘭卡，故也被稱為“孟喇嘛”），由他陪同赴藏旅行。大衛·妮爾一生中共寫過 26 部著作，被譯成了西方的多種文字並且反復再版。此外，她還有數目多得驚人的論文。她先後著有《旅行日記》(2 卷)、《大西藏和遼闊的中原》、《佛陀的佛教》、《永生與轉生》、《嶺·格薩爾的非凡生平》、《智燈》、《藏傳佛教的秘密教義》、《喇嘛教的灌頂》、《在喜馬拉雅的心臟》、《未刊藏文文獻》、《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之行》（此書有筆者中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在土匪一紳士之鄉》、《西藏的巫術和巫術師》、《奧義之魔力》，《五智喇嘛》、《愛情巫術和黑色巫術》、《空的勢力》、《喇嘛教中的 8 種徵兆》、《古老的西藏

面對新生的中國》等。此外，大衛·妮爾的傳記已出版三種：《大衛·妮爾的西藏》（圖片集，大衛·妮爾西藏文化中心版），《大衛·妮爾光輝的一生》（讓·夏倫，1985年）和《與大衛·妮爾一起生活的10年》（佩羅耐，1965年）。近年來，隨着旅遊業的發展，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藏學界，又出現了一股研究“大衛·妮爾熱”，其書再次暢銷。

本世紀上半葉，其他法國旅行家們也都發表過藏學著作。吉博和利奧塔爾曾在西藏東部從事過兩次探險，對所經過的地點作了測繪，搜集了豐富的關於藏族的人類學資料。利奧塔爾在這次探險中遇難。他的第一手探險資料已在利奧維埃的幫助下刊布；載于1965年巴黎出版的《西藏民族學論文集》。塞佩林曾對木斯塘地區作過考察，于1968年在巴黎出版了《境外的藏族王國——木斯塘》一書。他在這次旅行中會見了一些藏民，1962年在巴黎出版的《西康的騎士》，就是根據這些人的敘述介紹了1950年以來昌都藏族人的情況。

古伯察（Evariste Huc，1813—1860）是法國遣使會傳教士。他于1844年8月3日偕其長上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并由原籍為青海碾伯縣的土族喇嘛桑木丹淨巴陪同，從熱河的黑水川一帶出發，經由蒙古諸旗、鄂爾多斯、寧夏、甘肅和青海，經過18個月的長途跋涉，于1846年1月29日到達西藏拉薩。他們在拉薩居住兩個多月之後，被當時的清朝駐藏大臣琦善奉清廷的命令驅逐，被解往四川，後又到達澳門。他在那裏寫成了其傳世名著《韃靼西藏旅行記》（此書有筆者中譯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版），1854年首次用法文在巴黎出版。該書記載了中國北部、西北部和西藏地區的風土、人情、宗教、

社會以及他們與各界的交往。

古伯察是第一個進入西藏拉薩的法國人，也是當時從西藏活着返回去的少數歐洲人之一。他的這部名著先後被譯成英文、德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俄文和日文，每種譯本都曾多次重版，成了研究 19 世紀末西藏史的第一手寶貴資料。漢文史籍中對古伯察神父的這次旅行也有較詳細的記載，如《清實錄》、《清代藏事輯要》、《東華錄》和《籌辦夷務始末》等，特別是駐藏大臣琦善、四川總督寶興、廣東總督耆英就這件事呈報皇帝的奏折以及清廷的批文或“廷寄”，此外還有中法外交機構交涉的外交文書。它們與古伯察的旅行記都非常吻合。

古伯察還有一部 4 卷本的《中國中原、韃靼和西藏的基督教》，1857 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後來又被譯成多種文字並反復重版。它是第一部關於基督一天主宗教在西藏傳播的史書。古伯察當時還在《傳信年鑑》和《遣使會年鑑》中發表過不少有關西藏天主教的著作。伯希和曾給予古伯察及其著作很高的評價。

法國當代女漢學家雅克玲·泰夫奈 (Jacqueline Thévenet) 于 1989 年在賽格出版社推出一本古伯察傳《西來的喇嘛》(此書有筆者的中譯本，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版)，收入了《驚人的旅行家》叢書。此書詳細介紹了古伯察從澳門到北京，又經蒙古、寧夏、甘肅、青海而入藏以及從西藏回到澳門的全過程。此書有耿昇中譯本，山東畫報社出版社 2003 年版。泰夫奈搜集到了古伯察在中國（中原、蒙古、西藏）時所寫的一批書信。她于 1992 年在基梅出版社出版了古伯察中國書信集《誰還在想着韃靼地區？》但由于泰夫奈主要是蒙古史學家，故在這兩

部書中，韃靼地區所占的比例較大。泰夫奈于 1990 年在《歷史》雜志第 517 期中，又發表了介紹古伯察生平的長文，特別是介紹了當時法國駐華領事敏體呢（Charles de Mintigny）為古伯察入藏一事與中國政府的交涉過程。

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也從事過藏學研究。他是法國科學院院士，曾先後出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亞細亞學會會長和《通報》法方主編。他于 1906—1908 年在西域探險期間，曾把大批敦煌寫本、西域文書和文物劫往巴黎。其中有 2000 多卷敦煌藏文寫本以及在西域其他地方發掘到的藏文文書。對這批敦煌寫本的研究，形成了法國藏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甚至是法國藏學研究的超長熱點。他的西藏學著作主要有 1920—1921 年在《通報》中發表的《吐谷渾和蘇毗》、《漢譯藏文名稱》、1925—1926 年在《通報》中發表的《秦神父和古伯察的西藏之行》。他曾對當時的西藏學著作發表過書評。其遺作《吐蕃古代史》一書，實際上是對《舊唐書》和《新唐書》中吐蕃傳的譯文，可惜未加注釋，在他死後由其弟子韓百詩作為《伯希和遺作》第 5 卷于 1961 年在巴黎出版。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是當代法國著名中國學家。他于 1894 年 9 月 13 日誕生于瑞士洛桑，1979 年 3 月 23 日逝世于巴黎。他 1919 年在伯尼爾中學畢業之後，又先後赴慕尼黑、倫敦、愛丁堡和巴黎求學深造。1914 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投在當時西方的中國學名流微席葉和沙畹門下，陸續學習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歐語系許多語種。戴密微 1918 年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畢業後，于 1919 年成為當時設在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的公費學員。他 1919 年赴中國考察，1924—1926 年間

在廈門大學執教席，講授梵文和西方哲學。他于 1926 年赴日本，先任日佛會館會長，1929—1930 年間任佛教百科性刊物《法寶義林》主編。戴密微在遠東生活十多年，1930 年返法國，先在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任教，從 1945 年起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繼馬伯樂任歷史語言系的研究導師，從次年起繼伯希和主持法蘭西學院的中國語言和文明講座，直到 1946 年退休。戴氏中國學著作共 160 多篇（部），書評 100 多篇。

戴密微的藏學、敦煌學和佛教學名著，就是他于 1952 年作為《漢學研究所文庫》第 8 卷而出版的《吐蕃僧諍記》一書（此書有筆者中譯本，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臺灣商鼎出版社 1992 年再版，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再版）。該書涉及到了唐史、吐蕃史、唐蕃關係史、西域史、佛教史、禪宗入蕃史、吐蕃進出西域史諸領域。他的學生和事業繼承人——原法蘭西學院教授和法國科學院院士謝和耐先生于 1979 年在《通報》中撰文，稱該書“每一條注釋都堪稱百科全書的一大條目”。日本著名敦煌學家藤枝晃，也稱該書是“當代歐洲佛教學和中國學的最高權威”。全書共分兩章。第一章論述 8 世紀時在吐蕃贊普墀松德贊（掌悉籠臘贊，有人認為此人是吐蕃贊普弃臘蹄贊和唐金城公主的兒子）主持下，由漢僧摩訶衍與印度僧侶蓮華戒在邏婆（今拉薩）就禪宗問題展開的一場大辯論。書中譯注了 P.4646 號敦煌寫本《頓悟大乘正理決》。它包括前河西觀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作的序、大辯論的漢文檔案和摩訶衍呈贊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長篇注釋中表現了他在梵文和藏文、佛教教理和經典方面的特長與淵博學問。第二章是史料疏議，譯注了大批有關唐蕃關係的敦煌漢文文

書（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詩文殘卷）。他首次刊布了一大批有關唐蕃關係史的敦煌寫本，提供了許多不見諸漢藏史籍的資料。書中關於沙州（敦煌）于貞元三年（787）陷落於吐蕃的結論，現已成為西方普遍接受的觀點。此書的寫成，實際上曾得到我國學者王重民多方面的幫助。

這次僧諍對於藏傳佛教史，尤其是對於吐蕃禪宗史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這一事件不見諸漢文載籍，唯有晚期根據傳說或第二手資料寫成的藏文著作《拔協》（14世紀）、《王統世系明鑒》（1388）、布頓（善逝教法史）（1322）及《賢者喜宴》（1545—1565）中偶有記載。敦煌藏文寫本中也有記載（如 Pt.823 號）。但敦煌寫本與晚期藏文著作中的記載完全不同，主要是表現在有關這次僧諍的結果問題上。藏文著作認為是印度人獲勝，吐蕃贊普反對漢僧摩訶衍一方。敦煌寫本却認為漢僧于辯論中大獲全勝，吐蕃贊普允許摩訶衍等在吐蕃傳播禪宗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一批吐蕃人皈依禪宗。祇是由于吐蕃王宮某些大臣“謀結明黨”，漢僧纔受迫害。藏文著作是晚期的傳說，敦煌寫本則是在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或是同時寫成的，為該檔案作序的世俗文人王錫就是見證人，奉大師之命作序，所以它更為翔實可靠一些。

戴密微 1960 年在家本善隆祝壽文集《佛教史論叢》中發表了《有關中國禪宗的兩卷敦煌漢文寫本》，其中 S.2672 號敦煌寫本也是有關這次僧諍的，基本與 P.4646 號相同，但多 20 頁，個別措辭和句子也略有小異。戴氏對這兩卷寫本對照比較後，互相參照作了校勘，使之成為一部非常寶貴的小部佛典。

戴氏著作發表 40 多年來，對這次僧諍會的爭論越來

越激烈。意大利藏學家圖齊（G.Tucci，1894—1984）于1958年在，《小部佛典》第二卷中，根據晚期藏文史料，尤其是根據《賢者喜宴》而反對“拉薩僧諍會”一說。他認為這場大辯論是在桑耶寺舉行的，提出了“桑耶寺僧諍會”之說。1964年，日本禪宗研究專家上山大峻又發現了一卷叫做《大乘二十二問》的敦煌漢文寫本，其內容也是針對這次僧諍會的。他于是便得出結論，認為共舉行過兩次討論會，第一次摩訶衍獲勝，第二次蓮花戒獲勝。

戴密微1970年在《通報》中發表過10餘萬字的書評《敦煌學近作》，對日、前蘇聯、法、美、意、匈、新加坡以及我國港臺22篇（部）敦煌學著作作了評價。他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放棄“拉薩僧諍”之說而接受“吐蕃僧諍”（“僧諍”應該就是佛教中所說的“結集”，梵文作 Sangiti；也就是辯經）一說。他認為從未舉行過一次或兩次面對面的僧諍會，祇不過是持續了數年的一場筆墨官司，因而建議將其書易名為《吐蕃僧諍記》。今枝由郎1975年在敦煌藏文寫本中找到了有關這次僧諍會的藏文文書，也支持“吐蕃僧諍”一說。日本藏學與佛學界的一批後起之秀也參加了這場辯論。戴密微1979年在《敦煌學論文集》第1卷（于他死後出版）中，發表了《從敦煌寫本看漢傳佛教傳入吐蕃的歷史》，對這批日文著作作了分析。他又根據《歷代法寶記》和《楞伽師資記》等敦煌漢文寫本以及《拔協》等晚期藏文著作，而提出由無住（714—774）及其師無相（684—762）為代表的四川“成都宗”，在禪宗傳入吐蕃中所起的作用。新羅僧無相就是《拔協》中的金和尚。曾于750—760年間會見墀松德贊的使者。

關於吐蕃僧諍的辯論，形成了法國在有關吐蕃古代史

的敦煌文書方面的第三次辯論高潮。它使人更透徹地理解到8世紀之後的唐蕃關係以及禪宗入蕃史，特別是吐蕃進出西域的歷史。

戴密微的其他藏學著作還有：《西藏》（1923）、《在吐蕃舉行的一次佛教僧諍會》（1937）、《漢藏關係一瞥》（1949）和《論毗舍離結集》（1951）等。

圖散(Charles Toussaint)是一名研究西藏宗教的專家。他曾與巴科和托瑪斯合作，于1940年出版了《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一書。1933年在巴黎出版了《蓮花生遺教》的譯注本，根據理塘所藏這部遺教的藏文本而譯成法文，文筆雖優美却不忠于原文。他還有一些零散的藏學著作。

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是著名的蒙古史和西域史學家。他1906年誕生于法國利古熱，1978年逝世于巴黎。韓百詩自1929年加入法國亞細亞學會後，一直從事西域和高地亞洲史的研究，成了伯希和的得意門生和未竟事業的繼承人。他1942—1947年間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講授蒙古語，1947—1950年間任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所長。從1952年起任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4系的研究導師，1956年起主持法蘭西學院的西域歷史和文明講座，1959—1973年任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該所自1973年劃歸為法蘭西學院）所長。他還擔任過法國亞細亞學會的副會長、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西域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他專長蒙古學。但也涉足蒙藏關係和使用藏文史料研究蒙古史。伯希和遺作《吐蕃古代史》就是由他整理出版的。他于1977年在《拉露紀念文集》中發表過《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史和松巴堪布的〈如意寶樹史〉》一文，指出14世紀後的大量藏文編年史中包括有關蒙古史

的資料，如 1346 年的《紅史》中包括蒙古人的簡史，1434 年的《漢藏史集》中包括蒙古世系，1476—1478 年的《青史》中也載有蒙古人的歷史和世系表。作者將《蒙古源流》、《金輪千幅冊》、《黃金史》和《寶貝念珠》等蒙古史料與松巴堪布的藏文著作《如意寶樹史》等作了比較。他的其他與藏學有關的著作還有《吐谷渾考》（1948）、考證 Pt.1283 號的《克什的迷考》（1958）等。

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9）小姐是法國一代藏學名師。她于 1890 年 8 月 23 日誕生于法國默東，1969 年 12 月 15 日逝世于巴黎。拉露一生中未獲得過任何文憑，全靠自學成才。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志願護士，由于偶然機會結識了當時法國的印度學、中國學和佛教大師烈維。她于是便隨他學習梵文，後來又在巴科指導下終生研究藏學，也曾與普祖魯斯基合作共事。

拉露的主要功勞是編寫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這套 3 卷本的目錄分別于 1939（第 1 卷，1—849 號）、1950（第 2 卷，850—1282 號）和 1961（第 3 卷，1283—2216 號）年在巴黎出版。她對每卷文書的定名、內容提要、篇幅、紙張、字體特徵都作了描述和考證，抄錄了經文的題跋和一些主要藏文段落。雖然其中仍有不少錯誤和遺漏欠妥處，但它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寫本的必不可缺的工具書。伯希和生前在編寫敦煌寫本目錄時曾把前 2000 個號留下，以供編寫藏文寫本目錄。巴黎藏敦煌藏文寫本觀已遠遠地超過了這一數額。由于許多藏文文書寫于其他文書的行間或背面，既有成篇的長卷，又有幾行或幾個字的短篇。有些藏文文書曾被用作其他文書的修補件而粘貼了起來。所以自拉露編目以後，

又不斷有新“發現”，拉露目錄也就顯得越來越不完整了。拉露不懂漢文，再加上當時的條件限制，她對於某些譯自漢文的經典以及佛經文書的定名和考證也存在不少問題。

拉露藏學著作共分文學、藝術和圖像、語言、文獻、宗教、書目、歷史和東方學史諸領域。

為了紀念拉露 80 嗣誕，法國國家科研中心資助由美洲和東方書店于 1971 年出版了一部《西藏學論文集》（《拉露紀念文集》）。書中發表了 21 篇具有相當水平的藏學著作。作者中不僅有法國的巴羅、布隆多、麥克唐納夫人、菲利奧扎、韓百詩、石泰安和吳其昱等一代名流，而且還有意大利的圖齊和伯戴克、英國的黎吉生、匈牙利的烏瑞和李蓋提以及荷蘭的戴瓊等世界範圍內的藏學名家。這部藏學論文集直到目前仍是法國最有權威的藏學著作之一。

菲利奧扎 (Jean Filliozat, 1906—1982) 是法國當代最有權威的梵文專家。他于 1906 年誕生于巴黎，1982 年 10 月 27 日逝世于巴黎。他年輕時曾學習過醫學，後因受印度文明的吸引而在烈維和傅舍的指導下學習梵文。菲利奧扎于 1936—1941 年間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任教，1937—1939 年間同時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兼課，1941 年起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掌教席。1952 年起主持法蘭西學院的印度語言和文學講座，1956—1977 年任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他從 1966 年起被選為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1974 年起任法國亞細亞學會副會長。他主要是結合印度學而從事藏學研究的，其主要藏學著作有 1937 年在巴黎出版的《呼縛拿的鳩摩羅怛特羅》一書，書中使用了梵文或土著語言翻譯的藏文醫學著作。他的《評西藏史近作》(1962) 介紹了一大批當時法國出版的西藏史著作。此外還有《密